

西方学者论

毛泽东思想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室编译处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西方学者论毛泽东思想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室编译处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3年·北京

(京)新登字 071 号

责任编辑:霍海丹
责任校对:邹祖兴

西方学者论毛泽东思想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室编译处 编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通讯处:北京 1929 信箱 邮政编码:100091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宫门前甲 10 号

电话:(01)2581570 传真:(01)2581532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北京环球科技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 13.75 印张 355 千字

1993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2000 册

ISBN 7-80023-705-2/D·95

定 价:10.50 元

编 者 的 话

随着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取得革命事业的胜利，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开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毛泽东及其思想在世界上产生了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同时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研究兴趣。在西方国家，自 40 年代末就有一些学者开始研究毛泽东思想，到 60、70 年代，研究队伍迅速扩大，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研究热潮。进入 80 年代，由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作出了全面的科学的阐述，西方学者普遍受到很大震动，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以前的观点。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后，他们纷纷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许多人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更趋于深入。从 4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这 40 年多年时间，据不完全统计，在毛泽东思想研究领域，西方学者发表论文近两千篇，出版专著约二百余种。

西方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者，除少数为反共的御用文人外，多半都是很严肃的学者。他们注重研究的学术性，试图对毛泽东思想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有的甚至力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对毛泽东思想作出科学的阐释——这部分学者在研究中，常常采用一些我们不熟悉的研究方法或置身于新的观察问题的角度，常能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当然，由于他们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和他们世界观方法论上的不同，以及掌握材料的局限，他们的见解也不都是正确的，甚至有一些是偏见。了解这些学者的见解以至偏见，对于我们中国学者的研究工作来说是有意义的，至少可以促进我们去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和写出有针对性、有说服力的论著。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不能在封闭状态下从事毛泽东思想研

究,而应当加强同国外学者的学术交流,了解国外的毛泽东思想研究状况,开拓视野,增长见识,推动我们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向新的深度和广度发展。

为便于国内学者了解西方毛泽东思想研究状况和加强对国外有关论著的评析工作,我们重点收录80年代以来西方知名学者发表的有参考价值的专题论文和专著的部分章节,选辑了这部《西方学者论毛泽东思想》译文集。从内容上看,入选的论著主要论述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毛泽东的政治思想、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毛泽东的方法论等。从学术观点上看,既有正确的观点,也有值得商榷以至完全错误、我们不能同意的观点。这些论著基本上反映了8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整体水平。

通读这些论著,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学者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多半给予很高的评价,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观点。如施拉姆等学者认为,“毛泽东是我们时代第一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打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并在这方面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功”。尼克·奈特认为: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实质上是“试图制定一个公式,既不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又能够将这种普遍原理运用于一个国家的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文化环境”。毛泽东“既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问题,又不偏离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还提出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一种新的发展战略,这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在亚洲的发展,显然具有重大意义”。霍勒布尼奇等学者说:“毛泽东建立了唯物主义认识论,他运用唯物主义认识论对本体论作出了辩证的解释”;毛泽东“引用中介因素,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飞跃作出了理论性解释,弥补了马克思主义的不足”。沃马克认为:“阶级斗争理论和政党理论是毛泽东政治思想的两个基本方面,与马克思相比,毛泽东的阶级观更直接集中在政治潜力问题上,与列宁相比,毛泽东的政党观在更大程

度上涉及党与群众的依存关系。毛泽东的政治范式并没有在中国取代马克思主义,而是通过制定具体政策,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之间发挥着一种中介作用。毛泽东思想,一方面特别中国化,另一方面又服从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真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产物”。以上这些看法应该说是符合实际的,是值得赞许的。

当然,西方学者有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们的许多观点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例如,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来源问题—— 窦宗仪认为,毛泽东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两个方面的影响,“儒家思想对毛泽东影响之大不亚于马克思主义”。沃马克说,“无论过分强调毛泽东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因素还是中国本身的因素都是错误的,毛的理论显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毛的实践环境当然是中国环境,因此可以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政治文化并列为毛主义的两个不同来源”。这就是说,毛泽东思想有不分主次的两个来源。这种看法显然失之偏颇,因为毛泽东思想并不是游离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之外的另一个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始终是毛泽东解决政治和社会实际问题的基本依据,毛泽东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这种结合当然也包含同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但是毛泽东思想没有简单地照搬中国传统文化因素,而是批判地继承了其中体现民主精神的精华部分。因此笼统地将毛泽东思想理解为东西方两种文化不分主次的合并和融合是不符合实际的,毛泽东思想的主要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

再如,施拉姆、沃马克和迈斯纳的文章都提出毛泽东思想含有民粹主义倾向。他们以毛泽东的一些言论和思想表象同民粹派相类似为由,断定毛泽东思想的各个发展阶段都与民粹派的思想密切相关,甚至认为“如果不是由于民粹主义倾向将毛吸引到农村,并且提供给他那种对农民群众的自发革命创造力的完全非列宁主

义的信仰的话，则极不可能在中国进行一场成功的共产主义革命”。他们提出这种看法的主要“依据”，显然是毛泽东对待农民和农村问题的有关思想、观点和态度。诚然，毛泽东很重视农民工作，并在大革命失败后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但是他的农民观和农村观同民粹派截然不同。毛泽东重视农民，把农民作为革命的主力军、革命的主要动力来依靠，但绝不盲目地崇尚农民的自发性，而是强调教育农民，改造农民，对农民实行无产阶级的领导。相反，民粹派认为农民是天然的社会主义者、天然的共产主义者，不需要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毛泽东从未维护农村的小生产私有制度，而是认为分散的个体经济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的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实行土地改革，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为了解放农村的生产力。而民粹派是把农民村社看作比较理想的天堂，试图绕过资本主义，从农民的个体私有制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由此可见，在对农民和农村的看法上，毛泽东思想与民粹主义根本不同。

西方学者说毛泽东思想含有民粹主义倾向，实质上是提出了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他们认为，毛泽东对待农民和农村的态度，不是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而是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强调依靠工人阶级，而毛泽东把农民看作中国革命的主力军；马克思主义强调革命重心在城市，而毛泽东在大革命失败后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马克思主义强调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部队，以工人为主体，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成分是农民。在他们看来，毛泽东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民粹化，而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应该说，这是一种误解。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一是他们脱离中国实际，教条主义地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规范”毛泽东思想；二是他们满足于在毛泽东思想与民粹主义之间做简单的类比，不能透过现象领会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事实上，毛泽东在农民和农村问题上并没有偏离马克思主义，而是创

造性地运用、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

又如，西方一些学者还认为毛泽东思想含有乌托邦社会主义倾向，主要表现在如何对待现代资本主义的问题上。迈斯纳的《毛泽东思想中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论题》一文，集中反映了这种观点。迈斯纳认为：“毛泽东否认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前提，否认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直接有关的阶级的历史活动，充分体现了毛主义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特点”。迈斯纳的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首先，毛泽东在以马列主义原理为指导，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思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时，一直很重视发展现代工业。抗日战争时期，他说过，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就必须发展工业，要使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须工业化。新中国成立后，他一再强调中国迅速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近百年来之所以落后，主要就是没有新式工业。这说明毛泽东并不否认社会主义要以发展社会化生产力为前提，并不否认社会主义要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其次，基于以上考虑，毛泽东对资本主义也不是持简单否定的态度，不否认在一定条件下现代资本主义在社会发展中的进步作用。民主革命时期，他在中共七大的书面报告中就讲：我们现在提倡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中国应该发展资本主义，在一定的条件下，在不操纵国民经济的条件下发展资本主义有它的好处。他认为，从整个世界来说，资本主义是在下降，但世界上的一部分资本主义是有用处的。比如我们中国新民主主义制度下的资本主义，以及欧洲一切农业国家发展的资本主义。在中国来讲，这是有利于中国将来的社会主义；在世界来讲，是有利于世界将来的社会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是革命的，是有好处的。从整个世界资本主义来说，它是向下的，但发展是不平衡的。落后的地区还要发展资本主义，农业国家要发展一部分资本主义，这一部分资本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对社会主义有帮助。第三，也是基于上述考虑，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主张区别对待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鼓励民族资产阶级发展民族资本，并允许过去在

中国设立的外资企业在遵守中国法律的前提下继续合法经营。1956年,毛泽东还针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出现的“地下工厂”、“地下商店”现象,提出这样的意见:地下工厂,因社会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只要有市场,有原料,这样的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夫妻店,可以雇工,可以开私营大厂。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第四,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以后,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态度确实渐渐发生了变化。因为他发现资本主义经济有许多消极影响,弊多利少,而社会主义政权可以为发展生产力提供更有利的条件,于是他对在新制度下如何迅速发展生产力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提出了不同的思路和构想。如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过程中加快改造的步伐,将多种所有制形式改变为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提出“两条腿走路”的大跃进方针,开展人民公社化运动,等等。现在看来,毛泽东的有些思路和构想确实脱离了实际,其中也不乏空想成分。但是应该看到,这都是毛泽东在以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原则为指导,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时产生的偏差,是忽视中国生产力实际发展水平,教条主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原则和把革命战争年代的成功经验绝对化所造成的。因此不能说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是脱离实际的空想。总的来看,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是犯了超越阶段、急躁冒进的“左”的错误,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并没有脱离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框架。第五,至于毛泽东对与现代工业直接有关的工人阶级的态度,更不是迈斯纳等西方学者所论述的那样。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始终都重视工人阶级,把工人阶级视为领导阶级,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诚然,毛泽东很重视农民,这是因为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在总人口中占很大比重,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但是毛泽东从不认为农民是天然的社会主义者,从不认为中国可以在小生产的基础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他对农民的两重性始终有很清醒

的认识。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就告诫全党：“为了实现从农业国到工业国，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进入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后，他还多次讲过：“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农民，仍然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他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有天然的联系，但中国工人阶级必须居领导地位。中国工人阶级必须以广大劳动农民作为最可靠的同盟军，领导他们共同前进。可见，毛泽东重视农民，并不意味着他只依靠农民，更不意味着他否认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相反，他始终强调要加强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和教育。

在西方学者研究毛泽东思想的论著中，还有一些值得商榷的观点，这里不一一赘述。编者对几个问题提出一些看法，乃一家之言，目的在于提醒读者，在阅读时注意分析和鉴别。

本译文集收录的文章均为原文照译。个别文章在译编过程中作了少量文字删节。译者和编者做的少量注释均以文内夹注形式出现，用圆括号括出，并以“译者注”、“编者注”字样标明。凡出现在文章后面的注释皆为原作者注。

本译文集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室编译处编辑出版的国外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研究系列丛书之一，由马贵凡同志选编，王洪模同志审阅了本书的主要译稿。

由于水平所限，本书的编、审工作难免有疏漏、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1993年4月

目 录

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	〔美〕斯图尔特·施拉姆(1)
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	〔美〕窦宗仪(13)
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澳〕尼克·奈特(31)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	〔美〕弗里德里克·韦克曼(38)
如何认识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	
——评毛泽东研究领域中的经验主义	
·····	〔澳〕尼克·奈特(58)
毛泽东哲学思想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	
——关于《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	
·····	〔澳〕尼克·奈特(72)
毛泽东对马列主义认识论的贡献	
·····	〔美〕弗·霍勒布尼奇(88)
毛泽东认识论思想中的辩证观点	
·····	〔德〕英格·舍费尔(97)
毛泽东的斗争论·····	〔美〕约翰·斯塔(105)
关于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的哲学分析	
·····	〔美〕弗朗西斯·苏(131)
论毛泽东的社会变革因果观·····	〔澳〕尼克·奈特(141)
爱因斯坦与毛泽东:革命的比喻	
·····	〔美〕爱德华·弗里德曼(165)
毛泽东方法论的四要素·····	〔美〕弗朗西斯·苏(183)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美〕本杰明·施瓦茨(192)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美〕斯图尔特·施拉姆(204)
毛泽东思想所特有的民族形式	
·····	〔美〕金思恺(218)
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历史形成	
·····	〔美〕布朗特利·沃马克(226)
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	〔美〕布朗特利·沃马克(234)
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若干民粹主义观点	
·····	〔美〕莫里斯·迈斯纳(251)
毛泽东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	〔澳〕尼克·奈特(272)
毛泽东的统一战线学说·····	〔美〕詹姆斯·阿姆斯特朗(282)
毛对中国的梦想·····	〔美〕弗朗西斯·苏(294)
毛主义中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论题	
·····	〔美〕莫里斯·迈斯纳(305)
对毛泽东的初步重新评价·····	〔美〕斯图尔特·施拉姆(325)
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澳〕尼克·奈特(371)
如何研究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	
·····	〔美〕斯图尔特·施拉姆(387)
附录:西方毛泽东思想研究评介·····	路 远(391)
本书作者简介·····	(418)

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

〔美〕斯图尔特·施拉姆

1976年9月逝世的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是一位世界性人物。对他的评价，如果用通常对世界性人物的评价来估量是很不够的。这不仅是因为他在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领导中国人民恢复了国际地位，进行了国内现代化事业，而且还因为在那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无愧于国际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第一流实践家和革新家之一。

对这位中国领导人的伟大，他的成就及其持久性，应该如何作出恰如其份的评价的问题，人们可能有争论。但我相信，没有人否认，在我们这个世纪里，毛比任何人都更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多数。而且即使在他死后，这一点也仍有说服力。这是从世界的角度来说的。因为在世界的范围里，人们不得不把他与列宁这样的人物相比较。如果只就中国来说，那么，具有像毛这样气质的人物，至少近二百年来未曾有过。如果曾经出现过的话，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就不会这样低下，在我们的时代里对毛的挑战就会小得多。毛是我们时代的巨人。

毛是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然而，由于他厌恶从莫斯科输入的教条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也由于对莫斯科轻视中国农民表示不满，使他有15年时间处于党的领导主流之外。1935年，眼看党要毁灭之时，他立即担负起领导者的责任。由于机遇和良知，毛取得了胜利，并从此一直没有失掉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发言人的地位。另一次命运的拚搏，是1937年日本的侵略引起的。这次侵略宣告了中国反共分子的失败，而使毛进入了

爱国主义者的行列。

可是，直到1949年，毛已经55岁时，才得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由革命变为统治。最后，他领导中国27年，经历了从与斯大林的不愉快的联盟到令人瞩目的尼克松访华，从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接连不断地与他的同事——从刘少奇到林彪，甚至自己的妻子江青发生冲突。这段历史在现代找不出能与之相比的例子，几乎没有哪个活动家能在这样一个长时期中，如此彻底地、有独创性地进行如此多的活动。因为毛是人，作为人，他是有错误的。但不管怎么样，可以肯定地说，毛给了我们很多启示。

首先，就是打破马克思列宁主义老教条的束缚，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与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及成立后，毛为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而作的努力，可以说持续了半个世纪。当然，夺取政权期间的环境与建设社会主义所处的环境是完全不同的。但他所作的努力贯串了从1926年到1976年的整整一个时代。

如果我们想知道，面对中国这样一个具体国家和源于西方的革命理论，毛是怎么做的，我们不妨从他对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所持的观点谈起。1938年，在即将与中共党内的“国际派”（即亲苏分子）摊牌的情况下，毛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提出了这一问题。20年以后，为了决心再一次摆脱苏联的教条，提出有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式道路”，毛又反复提到这个问题。在1938年10月所作的权威性讲话中，毛号召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解释说：“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为马克思主义注入中国的特点，按毛的说法就是使之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使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内容适合于中国的具体条件。

那么就毛的观点来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应该包括哪些方面呢？一方面，它应该使马克思、列宁的观点和方法形成新的形态，来适合一个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绝大部分人口是农民的国家的具体情况。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他还加以强调的是学习历史遗产。他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同上面这种意思相类似的说法，是毛在 1942 年 2 月号召他的同志们“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它们应用于中国，并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整顿党的作风》）。

总之，毛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虽然在 50 年代中期，毛开始怀疑苏联模式的有效性，但他还是尊重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遗产，不过重点已逐渐从接受他们提出的社会主义“基本特征”转到认为必须对其予以修改和发展上。毛在 1956 年写道：“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我们必须接受它。但这个普遍真理必须要与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1961 年，为了答复 1960 年在莫斯科会议上有人批评中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毛又说：“每个国家的条件各不相同。过去我们吃了亏，就是不注意调查研究，只讲普遍真理”（《在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话》）。

西方有些人认为，毛的思想的结构和内容主要是由马克思主义决定的，而与其赖以发展的文化环境毫无关系。这种看法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毛本人反复号召的，不仅要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的条件，而且还要把中国的和西方的因素结合起来，成为一种新

的综合体。还有一些人把毛的思想看作是许多完全不同的(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西方的)思想影响的混合物,他们想提出一些根据来说明其中某种思想影响是主要的。持这种看法的人没有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半个世纪以来,毛泽东竭尽全力用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学说作为指导,并且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和说明他的政策的正确性。

毛的重大贡献之一,就是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也就是使党非官僚化。苏联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可以通过新的机关政治的大量干预来消除,可是这又造成了自身的不公平。毛是唯一认真处理这一问题的领导人。他认为领导者如果想要有效地进行领导,就必须倾听被领导者的意见。虽然有觉悟的、有深远历史眼光的领导是必不可少的,但如果不倾听被领导者的意见,这种领导就会变得无效和腐败。他的这种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曾引起西方知识界的很大注意。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已形成的关于政治领导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问题的概念,是由看来似乎矛盾,但却互为补充的两个方面组成的。一方面,他有力地强调革命领导集团的集中指导原则,认为这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贡献。在1942年2月1日开展整风运动的讲话中,他说:“有些同志不懂得党的民主集中制;他们不知道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他们忘记了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整顿党的作风》)。与此同时,他又号召实行“群众路线”,在1943年1月的指示中有这样一段著名的话:“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

题》)。

认为领导机关制订正确政策的思想源泉来自普通人民,并使人民理解领导机关制订的政策,而不是盲目地去执行它,这标志着同传统的中国思想中的一个重大观念的彻底决裂。《论语》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就是毛从五四运动以来就要他的同胞破除的孔子思想之一,尽管他是主张继承对中国仍然有用的和进步的东西的。可是,他在根据列宁主义的原理这样做时,并不否认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只能由外部输入,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的思想,应该成为整个社会的指导思想。

毛在延安提出的关于领导方式和领导过程的认识论方面的观点,一直到他生命结束,仍然是他在这些问题上的核心思想。

至于说到权力结构问题,毛在 1956 年 4 月,在总结关于中央权力机构和各级基层组织的关系问题时说:“正当的积极性、正当的独立性应当有,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中央对省市,省市对地、县、区、乡都不能够也不应当框得太死。当然也要告诉下面的同志,不要乱来,必须谨慎。可以统一的,应当统一,必须统一;不可以统一的,不应当统一,不能强求统一。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总之,地方要有适当的权力,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反而有利”(《论十大关系》)。

1958 年 1 月,毛还用 8 首歌诀,作为领导政治和经济的原则:“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诀,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毛解释它们的意思说:“这几句话里,关于党委的责任,是说大事由它首先作出决定,并且在执行过程中加以检查。‘大权独揽’是一句成语,习惯上往往指的是个人独断。我们借用这句话,指的却是主要权力应当集中于中央和地方党委的集体,用以反对分散主义。难道大权可以分揽吗?”(《工作方法六十条》)这样,下级机关要做的,就是在贯彻中央“大权”作出的基本政策决议的过程中发挥创新精神。虽然基层的各级机构只掌握有限的权力,但是在毛所提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群众路线的理论中,它们